

中国的国家特性、国家角色和外交政策思考

张清敏

【内容提要】 领导人对自己国家角色的判断是影响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重要变量，国家角色是由国家特性所决定的。本文运用国家特性和国家角色的理论视角，分析中国的国家特性，认为目前中国的国家角色是“发展者”，是否符合这一角色可以作为衡量中国外交政策优劣的一个有益坐标。

【关键词】 外交政策分析 国家特性 国家角色 中国外交

【作者简介】 外交学院外交学系副教授。北京 邮编：100037

一、引子

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身份一直是令研究中国外交的学者困惑的一个问题。一位西方学者曾感叹道：“说中国是‘东方国家’吧，中国更多的时间是在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进行斗争，而不是在捍卫这个阵营；说中国是‘南方国家’吧，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核国家、重要的武器提供国，它从未停止向‘北方’发达国家看齐；说中国是‘大国’吧，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还没有超过西班牙、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甚至还低于几内亚和多哥”，因此，对中国外交的总体把握相当困难。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在国内外交替出现，不断使中国的国际地位问题成为国内外学者争论的议题和媒体关注的焦点。在国外，认为中国强大者夸大中国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就和在军事上的国防开支，鼓吹和渲染“中国威胁”。认为中国很弱者提出《中国无足轻重》，“中国即将崩溃”。最突出的代表是西方学者西格尔在《外交政策》上发表的“中国重要吗？”一文。他列举大量的数字从经济、政治、军事、乃至文化层面上说明，“中国最多也只是一个掌握了外交战场上技巧的二流的中等国家。”“它具有伟大的潜力，并将永远是潜力。”

对中国的贬低，中国人同样也会非常生气。西格尔的文章发表后，《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予以批驳，指出：“读了西格尔的文章之后，作为中国人，心里是很不愉快的”；“全篇贯穿着一种西方至上的价值偏见，充溢着一种从骨子里看不起中国人的傲慢”，是“出自傲慢与偏见的思维方式”，是“不可理喻”的。尽管这篇本身就是在与西格尔论理的文章并没有拿出任何证据或数字来支撑自己的观点，国人对其表达的意思

引自曲星：《中国外交 50 年》，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年版，第 1 页。

Gerald Segel, "Does China Matter?" in *Foreign Policy*, vol. 78, no. 5, (September/October, 1999), pp. 24 - 36.

古平：《贬低中国用意何在》载《人民日报》，1999 年 9 月 6 日。

却颇为赞赏。该评论文章获得了该年度国内相当级别奖项的评论二等奖。

中国坚持自己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领导人曾明确指出,“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即使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实现了第二步战略目标,人民的生活达到了小康水平,中国绝非就不再是第三世界了。

中国学者对于中国的国家特性和国际定位问题,也没有一致的意见。西格尔的文章曾引起中国学者关于中国地位的讨论。国内有学者著书指出中国目前已经完成了崛起的准备阶段,进入崛起的起飞阶段,马上就又有文章指出,“在自己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把自己定位正在崛起,不仅会给自己的发展增加阻力,甚至还会给民族带来灾难。”有人主张中国应该有“大国的定位”,“中国应该有大国心态”;而另一些学者则提出,中国基本上是一个亚太地区大国,客观上讲,中国的影响力,中国的利益以及它所能发挥主要作用的地区,就在其周边。虽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互相矛盾的观点反映出国内外学者对中国的国际定位并没有一个总体的把握。本文提出这一问题决非为了捡起旧题,重新争论,而是希望借助外交政策分析的一些模式对中国的国家特性、在国际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进行一些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当今中国外交的一些问题和政策进行一些思考。

二、中国的国家特性与国家角色

在国际关系的研究中,国家被看作是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不同角色的行为体。如人们说一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了一个“领导者”,“平衡者”,“不结盟者”的角色等,说明在不同的国际环境和背景下这些国家的军事-外交行为与这一类国家所应遵循的原则是一致的。加拿大学者霍尔斯蒂(K. Holsti)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对国家领导人国家角色观念的产生依据和作用进行了研究。他指出,“国家角色观念是国家政策的制定者对适合自己国家身份的总体决定、承诺、原则,以及在连续性的基础上对其国家在国际体系或地区性体系内所发挥作用(如果能发挥作用的话)的总体概括。”国家领导人根据他们对自己国家角色的认识所采取的外交行为被称为“国家的角色行为”,“它包括对世界的态度、决定、反应、作用和对外承诺的总体规律。”正如一个人根据他自己在社会中的角色和社会关系确定自己的权利、责任,并采取适当行为一样,特定国家领导人心目中对自己国家在国际社会应该扮演的“角色”观念是影响或解释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变量。“国际体系不仅可以被看作是相互关系的格局,而且还可以被看作是在特

清华-环球论坛:《中国在世界中的地位》,载《环球时报》,2000年8月25日,第7版。

周建明:《中国已经崛起了吗》,载《环球时报》,1999年11月26日,第5版。

毛寿龙:《中国要有大国定位》,载《环球时报》,2000年8月18日,第7版;叶自成、李颖:《构建大国外交心态》,载《环球时报》,2001年7月20日,第7版。

阎学通等:《中国在世界上的位置》,载《环球时报》,2000年8月25日,第7版;《立足周边谋发展》,载《环球时报》,2000年3月3日,第7版;王缉思:《中美可以避免新冷战》,载《环球时报》,2001年6月22日,第7版。

K. J. Holsti, "National Role Conceptions in the Study of Foreign Policy,"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14, no. 3, 1970, pp. 245 - 246.

定时间范围内不同国家角色观念的分配。”

影响决策者对自己的国家角色认识的因素主要取决于各自国家的国家特性 (national attributes)。对一个国家的总体特性的衡量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现实主义基本强调国家的“力量”，特别是军事力量与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联系；地缘政治学者强调国家地理位置与外交政策的关系。当今国际社会已经进入综合国力竞争的时代，全面把握一个国家的国家特性并非易事。美国学者伊斯特 (East) 提出，需要从三个方面来总体把握一个国家的基本特性：1. 将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2. 不需参考或借助国家以外的实体就可以概括和衡量的特性；3. 这些特性在一定的时间内是稳定的。根据这三个标准，她认为一个国家特性应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国家所拥有的资源，包括土地面积、矿产资源、人口、地缘等。资源决定一个国家外交的基础或潜力，可供一个国家利用资源的多少限制着这个国家追求国家利益的手段。如果没有这样的基础，一个国家的外交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也将受到很大的限制。中国学者对中国定位的讨论大部分是从这一点出发的。

第二，将潜在的资源转换为实现外交目的的现实手段或能力，包括开发、发展、生产和转换上述资源的能力。衡量标准如经济发展水平、人民受教育的水平、科技发展水平、国家的组织能力等。这些因素和第一个因素一起构成国家总体的和基本的实力。资中筠先生看到有关中国定位的讨论后曾撰文指出，“要（给中国）排名，不能不考虑这十几亿人的生存状况、生活质量、教育水平、精神面貌、公民意识、法制观念、社会正义的概念等，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国民素质”；以及“各级政府的效能、公务员廉洁奉公的状况、经营人才的流向、智力发展的环境、促进或禁锢创新的机制、社会正义与公平的程度，乃至社会具有影响力的群体的道德风尚”等等。

第三，影响国家运用这些资源和实力的倾向或手段的要素。如由历史、社会、民族构成、宗教，以及作为国家代表的领导人（社会）的个性、倾向，以及政府的性质、决策机制和决策过程等。这些层面的特性决定或影响着国家在外交中将如何运用前述资源或能力。

从第一项来看，中国是一个大国，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一。从第二项来看，中国显然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国家，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如邓小平所说，“我们是一个大国，这个大国又是小国。大是地大人多，地多还不如说山多，可耕面积并不多。另一方面实际上是小国，是不发达国家，或叫发展中国家。”从第三项来考虑，中国要复杂一些，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多民族国家。在悠久的历史中既有辉煌的五千年，又有屈辱的二百年。完全不同的经历形成了两个矛盾的方面——自大和自卑、自豪感和屈辱感、仇外和媚外、向西方学习和抵制西方——交替影响中国人的观点，构成中国民族心理最重要的内容。在两千年的民族迁徙和融合过程中形成了以汉族文化为主体，又吸收了其他民族文化内涵的中华文化。像其他任何民族文化一样，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有

Holsti, "National Role Conceptions", p. 247.

Maurice A. East, "National Attributes and Foreign Policy," in *Why Nations Act: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for Comparative Foreign Policy Studies*, eds., Maurice A. East et. al. (Beverly Hill/London: SAGE Publisher, 1978), pp. 130 - 135.

资中筠：《做大国，以人为本》，载《环球时报》，2000年9月8日，第7版。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5页。

其积极的一面又有其消极的一面，而其两面性是如此紧密地结合在一切，将它们分开几乎是不可能的。受这种历史传统文化的影响，相对于西方国家，中国外交具有更多的领导人个性的特点。

可以说，中国国家特性的每一个方面都具有两面性：不仅文化中有两面性，传统中的辉煌和屈辱，以及由此而形成的自大与自卑；资源和潜力上的大国，发展水平上的弱国；影响力的全球性和发挥作用的地区性；制度上（与资本主义相比）的优越性，发展阶段的初级性或落后性……正是由于中国国家特性中每一个方面的两重性导致了对中国国家特性把握的困难，以及在外交实践中很好地处理其中相互矛盾的两个方面的影响更加不易。

霍尔斯蒂提出“国家角色观念”的概念时引用文革期间中国领导人的话，指出中国当时扮演了两个角色，一个是“革命解放者的堡垒（Bastion of revolutionary - liberator）”的角色，另一个是“解放的支持者（Liberation supporter）”的角色。这些与当时中国国内外的特殊环境分不开，但当时中国自诩为“世界矛盾的焦点，世界革命风暴的中心”的认识，实际上就是中国领导人对当时中国在国际上地位及角色观念的一种判断，而这种观念的确影响了文革期间中国外交政策的许多方面。那一时期中国外交的许多政策和行为，包括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同时对修正主义的批判、对中国革命道路的宣传、对世界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大公无私的支持等，都可以被看作是中国根据自己的“国家角色观念”所采取的“国家角色行为”。今天，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环境都发生了变化，在中国国家特性中仍然存在两面性和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更加复杂的背景下，中国应如何定位，以及在国际舞台上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确实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中国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革”，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来，中国内外工作的关系就实现了由“经济为外交服务”到“外交为经济服务”的转变。中国各项工作的中心一直是经济建设，外交工作就是为之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应该说，从此以后中国就有了一个新的国家角色——“发展者（developer）”。面对冷战结束后复杂的国际形势，邓小平在强调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的同时，还特别提出了“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方针。他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应该越搞越好，但对此不必张扬，到下一个世纪50年代，如果我们基本上实现了现代化，那就可以进一步断言社会主义成功，当然“我们不要吹，越发展越要谦虚”，“不随便批评别人、指责别人，过头的话不要讲，过头的事不要做。”这既是对我国外交战略策略的一种指示，也是对中国发展者国家角色的再次强调。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再次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必须抓住一切机遇加快发展。”此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只有发展了，我们才有解决各种问题和矛盾的余地。”“离开了发展、一切都无从谈起；发展不快，就要被动。”“在党面临的一系列任务中，发展始终是第一位的任务、根本任务、中心任务。党和国家的其他任务都要围绕这个‘第一要务’来进行。”外交需要国家的发展和壮大，而外交政策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2002年11月18日。

《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载《人民日报》，2002年12月9日，第1版。

的目的也必须为促进中国的发展和壮大服务，促进发展是中国当前最具体和现实的国家利益。只有发展自己，才能改变中国“弱”和“大”的双重特性为“强大”；才能使中国由一个具有全球影响的地区大国变为具有世界影响的世界大国；才能改变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状况，充分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只有通过发展自己，才能改变自己，才能解决外交工作所面临的问题。如果每一项具体的外交政策都根据是否有利于中国的发展为坐标，其得失就更容易衡量。

三、摆脱历史惯性的影响，更新观念，轻装前进谋发展

外交史不仅具有连续性，而且还具有惯性。连续性是有意识继承的部分，惯性则是不愿继承、希望改变的内容，由于历史上的政策对决策者或群众心理的影响是如此巨大，以至于使现有政策有意无意保持原来政策的某些内容、某些表述、某种态势或倾向。这些惯性已经成为制约中国外交与时俱进的主要障碍。要发展自己，不仅要有意识改变旧的不适应形势发展的政策，而且还需要汲取历史教训，摆脱历史惯性的负面影响。在这方面需要做的很多，这里仅谈如下几点。

1. 吸取教训，以开放的心态，根据是否有利于中国的发展对待国际社会出现的新观念，特别是围绕主权问题所产生的观念。这是历史教训所要求的。主权平等原本是随着西方民族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从不接受这一观念到接受并真正享有主权平等，中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从18世纪90年代英国使臣马格伦尼使华与清廷的礼仪之争，到鸦片战争，当时的中国政府以天朝大国自居，自认为是天下中心，西方列强和周边地区一样被称为“蛮夷”。当中国愿意接受主权平等的观念时，已经因为连续战败而处于任人宰割的地位。中国被认为是半开化的国家，西方根本不愿平等待我。只有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以后，中国才在国际上赢得了平等的地位和尊严。正因为其来之不易，我们特别珍惜这样的原则和地位。

世纪之交国际关系格局又一次发生巨变，现在的中国政府与晚清政府绝不可同日而语，但当今社会发展变化之神速也非上个世纪初所能想像。随着国家间联系的增多，全球化趋势对国家间加强合作的要求也越来越迫切。在此背景下，主权不容干涉等维系国际关系数百年，作为联合国基石的国际关系基本原则再次受到挑战——“人权高于主权”，“人道主义干涉”等观念已经成为主导当今国际关系格局的西方国家的主流声音。中国“站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一边”，反对借口人权问题对一个国家内政进行干涉，在得到一些发展中国家支持的同时，再次处于与国际关系格局主导者对立的一面。

诚然，接受一种观念并不意味着放弃维护自己国家主权和其他利益的斗争，并非要支持西方“新干涉主义”的行径，更非允许美国或其他任何国家干涉中国内政。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才能更好地为中国国内的经济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促进中国更快地发展。例如，在人权问题上，中国由拒绝与西方讨论人权问题，到同意通过双边和多边的渠道在平等的基础上交换意见，到在世界人权会议上积极倡导我们的人权主张，我们不许借口人权干涉中国内政的立场没有变，我们也没有放弃斗争，但基于观念改变基础上的策略改变使许多国家了解了中国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和观点，不仅收到了更好的斗争效果，而且改善了国家的形像，改变了中国在这一问题上的被动地位。观念的更

新是需要勇气的,但清末中国国门被炮舰打开与上世纪中国主动实行对外开放所得到的不同收益,要求我们以开放的心态对待随着全球化而产生的新观念。

2. 融入国际社会,更好地发展自己。因为中国是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被拉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的,而且一进入这一体系就被抛在最底层。新中国在国际上的平等地位是靠中国革命胜利而取得的,因此革命外交是新中国成立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外交工作的一个重要主题。表现在具体的政策中,就是始终有一个“反对”目标:反对美帝国主义(20世纪50年代)、反帝反修(60年代)、反对(苏联)霸权主义(70年代)、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80年代)。这些遭到中国反对的对象差不多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的国家。目前外交工作的最重要目的是为国内的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具体说就是要为促进中国的发展服务,不是为了世界革命,不是为了反对某个国家服务,但几十年革命外交所形成的惯性仍然影响目前的中国外交,今天“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是中国外交的一个重要内容,不少人留恋于早期的“斗争”外交,批评当今中国外交软弱。这是惯性使然。

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中国外交中还有一个主题,就是支持由广大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主张。自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不仅支持而且主张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应该说,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标志着中国已经进入了当时的,也是现在国际政治安排(秩序);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努力争取加入西方市场经济规则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融入这个经济秩序的标志。中国的经济也正是在融入现有的,也是旧的经济秩序的过程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中国一方面不断强调至今还没有一个国际组织能够取代联合国所发挥的作用,中国重视并支持其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也不断承诺在享受其权利的同时,遵守其规则,履行自己的承诺。另一方又一直把建立政治经济新秩序作为中国外交的一项主要任务。这是传统的革命外交惯性与现实国家地位和角色之间一种内在的矛盾的表现。要想在全球化的时代发展自己,就需要融入现有的国际社会秩序,熟悉并适应其规则和规范,也就需要中国彻底摆脱革命外交惯性的影响,与世界大国(往往是最有可能推行霸权和强权政策的国家)进行合作。

四、正确认识并实事求是对待中国对外关系的重中之重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大报告在阐述外交工作时,第一次把发展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而不是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放在中国对外关系的首位。对这一变化,有人称赞这是实事求是的,体现了中国外交更加务实;另一些人则表示不理解、甚至不同意,因为这背离了中国外交的一贯立场。对一项政策妥否的评价也存在一个评判的坐标是什么的问题。

在外交史上,中国一贯把发展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作为中国对外关系的立足点。但对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历史考察可以看出,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政策一直是中国总体外交战略的一部分,而中国总体战略的变化则是根据中国对美、苏政策而确定的。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一方面置身于发展中国家集团之外,另一方面坚持自己是发展中国家的一员;一方面强调决不当第三世界的头,另一方面又从不讳言自己是最大的发

展中国家，代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一方面大力支持他们，另一方面不管中国外交战略如何调整，外交政策如何变化，都把它们当作中国外交的天然同盟……这种政策反映了中国作为一个潜在的大国，在与世界大国的抗衡中力不从心的状况，也反映了中国国家特性的两个方面。中国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影响的增大，朋友的增多，或者为发展中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要实现上述目标，只能靠发展自己，提高综合国力，不能依靠中国是，或永远是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

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发展者，把发展自己作为目标，自然应该在对外关系中把最能促进中国发展的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放在首要的地位。从贸易方面考虑，西方国家中的美、日、西欧三大经济体与中国的贸易占中国对外贸易的一半以上。在中国实际利用的外资中，日、美、欧盟三者之和也占中国实际利用外资中除港台澳地区（占一半以上）外的一半以上。从发展自己所需的人才方面来考虑，美、日、西欧等国家为中国培养了中国发展所急需的人才。因此把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当作重点，是适合中国身份，符合中国利益，实事求是的做法。

在西方大国中，无论对世界还是对中国，美国无疑都是最具影响力的国家。美国对中国的敌视使除法国外的西方大国都不承认新中国，受美国对华关系松动的影响，不仅西方主要大国都承认了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也得以恢复。中国入世谈判持续十余年，由于受到主要是美国的反对，一直不能得以实现。中美达成双边协议之前，需要与中国签署双边协议的37个国家只有16个与中国达成协议，在中美达成协议之后，包括欧盟在内的其他国家在半年多时间内都纷纷与中国达成了双边协议。因此，中美关系是中国对外关系的重中之重。

在发展中美关系中需要实事求是地对待以下几个问题。一是我们常说，中美两国共同利益大于双方之间的分歧。对此说法具体化，就会发现这不是实事求是的。中美双方的共同利益包括：经济利益的互补性，维护全球和地区稳定等安全利益，反对恐怖主义，解决环境问题、跨国犯罪等全球或地区热点问题方面的共同点。双方之间的分歧不仅明确和不可调和而且远远多于共同利益：如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以及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差异等。即使在以上具有共同利益的每一个方面，也都存在着矛盾。如经济关系上的贸易争端，反对恐怖主义的一个标准和双重标准之间的分歧，在热点问题上的不同主张等。具体在安全问题上，中国目前所面临的所有问题或多或少都与美国有关。实际情况是，中美之间的分歧远远大于双方之间的共同利益。

诚然，外交上强调共同利益是一种策略。然而在另一个问题上却看不到类似的策略。如冷战结束以来，中国一直认为世界格局在朝多极化方向发展，并把推动多极化作为中国外交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然而也就在中国政府和舆论界热衷于宣传和推动多极化的20世纪90年代，单极化得到了加强。科索沃战争，美国所主导的北约抛开联合国单独行动，我们说多极化遭受挫折。美英更是不顾国际社会的广泛反对，对伊拉克发动战争，世界各国，包括一些西方大国也无能为力。事实表明，至少冷战结束以来世界格局发展的历程是一个单极、而非多极化的过程。

关于多极和单极的斗争，一度成为中国和少数其他大国与美国之间关于世界格局两种理念之间的矛盾。中国领导人指出，多极化不是针对哪一个国家的；有学者撰文提出“多极化并不等于反美”，这些似乎都有“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味道。科索沃战争后，

《人民日报》发表观察家文章指出，美国利用其政治、经济、科技和军事领域的优势，“企图加紧构筑在国际事务中由美国一家说了算的‘单极世界’。”但中国主张“单极世界是危险的，多极要比单极好，多极格局有利于中小国家维护自身的主权和独立，有利于他们发展民族经济。”尽管没有任何国际关系的理论，也没有任何中国学者对这种主张进行过系统的论证，多极化被看作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和中国外交所追求和推动的目标。在这种战略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再次成为中国的同盟军。一些学者提出，“发展中国家力量的增强，必将对世界格局走向多极化的趋势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有时候非洲还被单独看作是“多极格局中的一极”。实际上大多发展中国家认为，所谓多极化就是大国合作主宰世界，并不赞同多极化的主张。显然我们在进行这种宣传时并没有摆脱中国对第三世界政策惯性的影响，也没有把它与中国目前的地位、角色、任务和具体利益联系起来。

另外，对中美关系宣传也存在一个需要实事求是的问题。在发展与美国关系的过程中，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一直尽力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内，另一方面又对美国的国际地位，以及建立在这种地位基础上的霸道做法不满，因而表现出与美国既有合作的一面，又有斗争的一面。这种客观存在的两面性决定了中美关系发展的波折性。鉴于中美关系对中国总体外交的重要性，一旦中美关系出现了一些好的兆头，媒体就会视之为重大的外交成就，大张旗鼓地宣传中美关系如何好，诸如新台阶、新阶段、新的一页，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等多少次被用来形容中美关系而见诸报端。然而中美关系的规律决定双边关系不久就遇到新的挫折。这时舆论则把焦点集中在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上。还没等人们转过弯，一次新的访问，或一次会晤又被宣传为新的成就、新的阶段。对中美关系中任何一面的夸大宣传都不符合中美关系的特点：过于强调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不符合中国现实的国家利益；出于某种政治上的考虑，夸大双方之间的一点点成就，认识不到双边关系的矛盾性和复杂性，则与自己所常常强调的反对霸权主义，推动多极化的总体战略目标相矛盾。更为重要的是在两种极端之间频繁摇摆远远快于人们的心理转变速度和适应程度，在国人中就会不断产生中国外交太软的认识，更有人不时发出中国外交需要补钙的呼吁。这并不利于形成外交工作所需要的国内凝聚力。

五、以是否促进发展为坐标确定中国在全球和地区问题上的立场

作为有全球影响的国家，中国应该在解决全球问题时发挥重要的作用，在重大国际问题上应该有中国的声音。中国领导人在同美、俄、法等国领导人会晤时经常强调，“作为世界上有重要影响大国”，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负有共同的历史责任”。但是，作为一个地区大国，中国的影响力还主要集中在亚太地区，如APEC、上海合作组织，以及东亚地区的中国、日本、韩国与东盟之间的一系列合作和安排等。在解决地区热点问题上中国所发挥的作用也集中在亚太及周边地区。至于中东问题、海湾问题、科索沃问题、更远的如拉美问题等，中国采取相对超脱的态度。一方面是由于我们是一个发展

观察家：《论美国霸权主义的新发展》，载《人民日报》，1999年5月27日，第3版。

中国家，力量和影响有限，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这些问题与中国的国家利益关系不很密切。

在处理全球和地区问题上，哪些应该超脱，哪些应该当仁不让的，其坐标自然也是国家利益。具体来说，在事关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和国家安全的问题上，中国无退缩的余地，如台湾问题。在领土主权和安全得到保障的情况下，最大的利益就是经济利益，再具体说就是创造一切可能条件发展自己。重义轻利的文化传统和建国 50 年来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实践所形成的惯性使我们羞于将国家利益明确宣示为政策取向。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这是人人都理解的一句话，但是在判断形势、制定政策、特别是在理解和认识中国外交的每一项具体政策时，却并非人人都能做到。如对于中国在伊拉克问题上的政策，有人提出中国没有发挥任何作用，指责中国外交无所作为。如果根据是否有利于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为依据判断，中国政府自然应该站出来反对美、英；如果按照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判断，这样的指责似乎也是能站得住脚的，因为事情的是非曲直也是清楚的。但是如果按照是否有利于中国的国家利益，促进中国的发展来判断，中国的政策显然是最好的选择。用同样的标准来衡量中国在美英发动对伊战争问题上的政策也就容易理解了。

当然，并非可以借口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在中国应该发挥作用的时候也退避三舍，不讲任何原则。在国力不济的情况下，高明的外交更应是国家的珍贵财富和资源，应该成为弥补国家其他方面不足的有效手段。作为有潜力，有一定基础和政治资本的国家，充分利用现有的资源在多种力量的冲撞和利益的矛盾中，冷静地分析形势，着眼于促进中国的发展，制定适当的政策就更必要了。此外，随着发展步子的加快，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国家利益的需求随之也会增加。这就需要更积极、更主动的外交政策。如中国在中东的利益曾经很小，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置身于中东事务之外。如今中国石油消费的 1/3 依赖进口，其中的 2/3 来自中东地区，中国继续被排除在由联合国其他常任理事国都参加的关于中东问题的多边安排进程就越来越不符合中国的利益了。又如中国曾经常常以不向国外派出一兵一卒而自豪，然而在中国不断强调要加强联合国在国际社会作用的冷战后时期，如果继续以此为荣仅仅派出工程、监督部队和民事警察等，而对另外一些国家在联合国框架下参加的一些行动多有怨言，实际上就是让过去的政策束缚住我们的手脚，既不利于我们的国际形象，也不利于对一些关系的发展，更是对我们现有外交资源的浪费。在许多国际问题上，中国外交不仅存在着如何摆脱历史惯性对现有外交工作制约，在更多的方面则需要智慧、勇气和创新，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新思路、新举措。

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坚信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必然走向共产主义这一基本原理。但“共产主义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充分发展和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才能实现。”这更需要中国牢记自己发展中国家的角色，把促进中国的发展作为外交工作的目标和首要任务。

外交工作尤其强调知己知彼。但在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中，研究彼的多，研究自己的少；研究自己的，诠释现行政策的多，客观分析自己的少。只有客观地研究自己，认识自己，清楚自己的根本利益之所在，才能制定符合自己身份又切实可行的政策。只有这样才能发展自己，进一步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为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